

“地方戏业余剧团”:大学传承非遗的创新实践

孙正国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中国大学传承非遗十余年,大学生社团担当了实践主体的角色,他们因不同的非遗类型而探索相应的实践方式。地方戏的传承在所大学都有积极实践形态,有的大学探索了组建业余剧团的路径,直接向老艺人拜师,与老艺人一起推动大学传承地方戏。这种直接建基于传承人授徒传艺的大学传承,包括两层结构:一是地方戏的传统结构,一是当代大学的文化结构。二者在“地方戏”与“当代人”的关联中并置,呈现出“戏骨子”与“大学生”良性互动的文化实践形态,为中国非遗传承提供了富于启示意义的实践智慧。

关键词:大学非遗传承;地方戏业余剧团;戏骨子;创新实践;传承智慧

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6-0016-06

自2006年国家非遗名录制度正式实施以来,大学非遗传承即随之开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①颁布实施,该法明确规定学校教育具有传承非遗的义务与责任,这为国家非遗传承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建立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大学生主动参与非遗传承,以个体与团体的形态,在教育体系中创造性地建立了非遗社团,并以丰富而激越的田野实践来回应国家非遗运动。随着大学非遗课程开设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大学生对非遗内容的庞杂体系有了新的认知,大学生非遗社团开始走向分类式的传承实践,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在大学非遗传承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笔者从大学教育的内在规律出发,重新思考文化传承之于大学教育的文化逻辑与精神意义^[1],从道的层次去理解地方戏之于当代大学的文化价值,进而面对大学生自发组建的“地方戏业余剧团”现象,阐释其在大学传承非遗中的民族情怀与历史寓意,并尝试在传承实践的方法论上作出前瞻性评价。

一、大学传承非遗的“文化本分”

在观察大学传承非遗的十余年实践中,有一个

比较感性却又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大学传承非遗属于它的“文化本分”。

大学教育的核心使命中,有一个常为人忽视的使命——“文化传承”。这一使命,不仅基于知识传承的日常教学过程,更主要的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担当。^[2]由于人们过多关注大学教育显在的多重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因而对“文化传承”使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漠视与淡化。事实上,大学教育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互为表里,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以人才为线索,建立培养、研究、服务和传承的综合目标式教育理念。^[3]就人才培养而言,科学研究是确保培养质量的基础,社会服务是人才培养的现实目标,文化传承则是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就科学研究而言,人才培养是推动研究的动力,社会服务是检验科学研究的砝码,文化传承是引领科学研究的灯塔。就社会服务而言,人才培养是实现社会服务的前提,科学研究是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通道,文化传承是社会服务的崇高理想。就文化传承而言,人才培养是实现文化传承的综合条件,科学研究是推进文化传承的理论条件,社会服务是历练文化传承

收稿日期:2017-10-1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经费重大培育项目(CCNU16Z02010)

作者简介:孙正国(1972-),男,湖北利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011年2月25日讨论通过)。

的实践条件。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四大使命共同建构了大学价值，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制。

文化传承对于大学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方面，从宏观的大学使命出发，辨析四种使命的基本关系。另一方面，更需要从微观的大学机制中阐释其意义。大学教育有三组基本的文化关系，一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二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承递关系，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青春成长关系。这三组文化关系，帮助大学教育建立起复杂的运行机制，同时也形成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校生态系统。^[4]

首先，我们从学校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关系来讨论文化传承。

中国观念的“象牙塔”^[5]算得上学校与社会二者之关系最经典的表述。“象牙塔”的文化寓意，表征着大学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组织，它具有自我规划、自我发展和自我守护的能力，代表着社会良知与精英意志。大学以“象牙塔”为据点，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社会庞大系统的世俗性，纯化了进入“象牙塔”的大学生可能被社会“大染缸”^[6]侵蚀的心灵，这种以守护者、捍卫者为本质的“堡塔意象”^[7]，折射出大学较之社会一般性组织具有显著的优越感。“象牙塔”还有一个富于召唤力的神圣光环，即以珍贵象牙为标志的高贵品质。这是对所有居于其中的人的品质的外化，也是对社会优秀品质的一种承诺与展示，因此，“象牙塔”也是“智慧之塔”和“精神之塔”的代名词。如果说“象牙塔”是大学精英主义时代^[8]的文化隐喻的话，那么，它所反映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则代表了自古典社会至现代社会人们创建大学的梦想与理念。

进入当代市场社会以来，尤其是后现代社会之后，启蒙、权威、精英、优越结构等都遭到质疑与批判，市场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拉平力”迅速打开了“象牙塔之门”，从守护者到“象牙塔”王子，都沉浸在消费主义时代^[9]的狂欢与“拉平”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正值我们当下的社会形态，每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都切身感受到文化圣殿的喧嚣，昔日的神圣光环早已黯淡，留给我们的是一份简洁而又平实的世俗之躯，“象牙塔”被套现为“更密集的消费广场”。精神指向的大学与世俗社会的普通结构，被圈化为功能与职业的平级分工。消费主义由此几乎占据了大学的核心地位，大学与社会的文化关系被深度融解，曾经标识着“文化地标”^[10]与“精神之塔”^[11]的

大学，终于走完了它的神圣旅程，在消费主义的一再索取与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巨大浪潮中俯首称臣，以“教育工厂”^[12]的身份重新进入社会。那么，这里就有了大学与社会交互关系中的文化转型逻辑，古典时代的“象牙塔”转向消费时代的“教育工厂”，这一文化转型恰好表达了文化传承在这组关系中发生的断裂，“象牙塔”守护文化传统，“教育工厂”拉平文化界限，一份寓含在大学机制中的社会理想与人文情怀，由于其文化传承使命被忽略而导致的文化危机悄然而到，这也许正是我们反思消费时代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命题。

其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承递关系所显示的文化传承问题。

大学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由于学生主体性的增强，较之中学阶段有更复杂的关系维度。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师生关系，核心是知识承递关系。教师的古典意味之“传道、授业、解惑”^[13]，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道”与“惑”。一方面，“道”与“惑”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有着代际差异的师生无法形成“道”与“惑”的共识，而且，随着学生主体意识的扩张，他们对“道”与“惑”的理解与处理越来越个人化，关于“大道”与“大惑”的内涵则愈来愈渺远不稽，难有认同。另一方面，“道”与“惑”是否为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受到质疑。学生本位的教育观念与职业化取向，将学生的知识获取与求职目标密切关联，于此，教师的“授业”被独立地予以使命感，工匠精神^[14]与技艺能力被作为评价标准灌注在教师的职业身份之中。也就是说，古典意味的人文教师已被放逐，市场意味的职业教师被专名化。知识承递关系的大学师生，因为“道”与“惑”的消解而呈现出简单的职业培训关系，知识的人文内涵不再是承递关系的一大主旨，承递方式也由此变成雇佣者与受雇者的技艺训练方法，在机械的反复练习中，教师与学生都被僵化，智慧形态的教学不可避免地褪色变质。

大学教育中的师生仍然具有超越职业范畴的文化关系。大学固有的探索与创新品格，包含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情怀，先天性地影响着师生基于大学意义而建立起来的同道关系^[15]，这是大学教师所经历过的大学时代与大学生正在经历的大学时代所潜在认同的“道”，即使职业化的大学教育已转换了师生的道统理念，然而，这种着迷于大学时代的人生追求，却以极其深邃的私密性的人际关系，映照在大学师生的知识教学过程中，历久弥新，不断沐浴和滋润

着由于职业化而疏离师生的古典道统。

再次,学生与学生之间青春成长的文化关系所显示的文化传承问题。

大学教育比之中学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学生进入青春成长时代。青春成长时代的大学生,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生活与全面深入的集体生活。大学生个体与个体之间构成了特别有力的文化关系,而且它们在大学教育的文化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很容易把大学生作为群体来观察与分析,却常常忽略大学生在大学时代的个体成长可能更为关键,个体的大学生与个体的大学生所交互形成的文化关系,才是大学生概念的本来面目。他们从个体的独立意识中不断地获取青春成长,又在青春成长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个体内涵。^[16]这种成长方式又特别地依赖于大学生之间的文化互动,从课堂的集体学习到图书馆的集体化个性学习,再到学生公寓的个体化集体生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青春成长变得蓬勃强劲,每个人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都在这种深刻的交互关系中得到融合,并且在大学教育系统的文化养成中为青春注入新的活力。

不过,今天的信息化与虚拟化现实正在影响着大学生之间的朴素关系。传统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大学生之间有着丰富的诚实感与信任感,隐私的个体往往是以某个小群体的开放作为存在理由。而信息化与虚拟化的大学生活中,咫尺天涯逐渐从浪漫伤感的记忆中走进实在的现实生活,移动互联网与虚拟人际交互平台已经不可替代地占据大学生交往的中心区域^[17],虚拟人格与多维面向建构着新型的大学生个体成长的复杂关系。多元、多层次的现实与虚拟并存的大学生个体关系,强烈地改写着早先较为单纯的人际关系,文化记忆所关联的现实因此而变得陌生且淡漠平常了。

可以说,上述三组关系所显示的文化传承都在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它们又在大学教育体系中不断唤醒自身的文化因素。文化传承使命植根于大学之中,虽然有着曲折而不断变迁的历史,但是我们坚信,文化传承是大学教育的文化本分。

二、“骨子里的传统”:地方戏的大学传承价值

地方戏的称谓十分恰切地显出了它的文化意义:承载地方文化传统,表达地方文化观念。地方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丰富而明确的指向,即与一个文化大统相呼应的,根源于地方文化而又感悟着

国家文化的综合艺术。在长达千年的艺术实践与地方建构中,我们常常把那些守护与传承地方戏的人称作“戏骨子”^[18],而他们所痴迷其中的正是“骨子里的传统”。

何谓“骨子里的传统”?

研究传统的学者们已经为传统设定了若干种内涵不同的概念,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者十分鲜明地表达着自己民族的传统观,毋庸置疑地强调不同传统中的文化价值与行为模式。古往今来,人类文化都在不断地接续传统,在异常丰富的形态中坚守着多元传统的精神取向与生活态度,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于是获得实践意义,在其文化主体的生命史上融入骨髓,深层次地建构个体的意义世界,这种力量,我们称之为“骨子里的传统”。中国文化史中称得上“骨子里的传统”的艺术,地方戏实属当之无愧。不仅因为它们较早地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占据着精神与生活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地方戏的艺术形态本身镶嵌着浓厚的“地方”原料,遵从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自然逻辑,将表演与日常合而为一,表演从日常中生根发芽,日常在表演中含苞待放;表演是日常的一次狂欢,日常是表演的终生家园。每个地方的历史与想象、人物与事件、信仰与禁忌,都必然地进入它的地方戏中予以表演,古老而单纯的地方色彩久而久之地化育地方戏,使其具有鲜明的不可移易的地方色彩。这种融历史于地域之中的化育规律,正是地方戏层出不穷、形态丰富而品性别致的文化根源。^[19]我们每逢一地,都不得不感叹中国文化有如此富庶、如此惊艳的地方戏传统,它们与当地形成的文化参照关系,不只是艺术思维的创造性关联,而且还是骨子里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召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种骨子里的传统,就是地方性传统。这种地方性传统,以表演艺术所呈现的深刻寓意,看似一种艺术方式和娱乐结构的简单主题,骨子里却是一方水土、一地人文的历史精华,是由戏剧结构、表演角色、生活仪式、参与群体和历史事件共同认可的生命哲学。^[20]

地方戏的中国传统有着别样的风景。它的起源可能与原始祭祀有关,人们在表达对自然神灵和人文先祖的崇拜与感恩时,以献祭与仪礼的方法去表演和呈现,祭司常常成为核心表演者,主持祭祀,扮演沟通人神的灵媒,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完整的仪式与规程,后来在文化演变与功能转换中逐渐从原始祭祀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地方戏。中国传统的形成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形态的文化过程,文化乡

土^[21]因此成为认识与理解中国传统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为文化乡土的经典形式,地方戏堪称中国传统的良窠与骨干,没有它们的融合与影响,不敢想象偌大的中国如何形成一统性观念与整体性格局。由此我们明白,一地一戏,如此方得其神韵,方成中国气候。

梳理地方戏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关系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虑地方戏与大学教育的内在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帮助中国文化实现了两大转型,一是民主意识的觉醒,一是科学系统的建立。从古典传统转向现代中国,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先锋的文化实践,有着鲜明的西方传统背景,同时兼顾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文化的制度与技术。^[22]我们不必过多批判西化过程的极端路径,只是希望由此反观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型带给古典中国的影响。最基本的影响是对传统所隐喻的价值观的否定。这一影响迄今仍在继续,大学教育借鉴西方制度而设计的课程体系和人才标准,即是一个典型例证。地方戏没有被纳入普通大学的课程之中,不是因为学分控制,而是因为对地方戏价值做出的否定判断。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地方戏对于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上文我们论证了大学教育有一个文化本分,即文化传承使命。顺此而论,地方戏作为中国古典传统的代表艺术,施之于大学生的课程任务,当为理所使然。就价值论而言,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内涵:

艺术价值。大学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它需要对人才进行艺术培养。地方戏是蕴含了本土历史、经验、材料和意义的综合艺术,它源自地方传统而又升华于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之中,意蕴独特,审美表达富于生活情趣。地方戏是丰富的,它广泛地分布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地域之中,以其卓有建树的乡土能量讲述中国文化的特质与魅力。地方戏所涵盖的艺术材料与文化因素驳杂深邃,艺术创新的资源条件充分,启示大学生的文化原创力非常强劲。当然,理论的阐释抵不住实践的选择,地方戏的表现形态越来越远离生活,远离当代的时尚艺术。^[23]大学生了解地方戏、学习地方戏的调查显示,地方戏与大学生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沟壑,它首先来自对艺术形态的了解与认知。大学生已经不习惯地方戏传统的艺术表达,更不愿意去选择学习地方戏。地方戏实际上已从大学生的艺术实践中淡出,而这恰恰成为我们观察大学传承非遗的一个小窗口,一面思考地方戏的命运,一面想象有可能带来艺术创新

的大学生最终会选择地方戏的传承。

认同价值。地方戏不是纯粹的戏剧艺术,它与地方文化一起建构了自主话语的文化表达。自上世纪早期的否定传统,至今刚好一百年。我们不断地学习西方文化,从技术到制度,再到观念,循环地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强化着我们民族的学习能力与文化态度。断裂式地否定传统,必然影响到地方戏的认同。或者反言之,否定地方戏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的断裂式的否定。文化无高下,文化无优劣,已经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文化基础理念。当我们朝向未来、世界表达我们的理想与价值的时候,地方戏恰好是极有意义的传统标识,它让我们重新获得文化身份与乡土记忆,重新贡献属于我们传统的艺术智慧与文化资源,重新明确我们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独特性与杰出价值。一方面,地方戏署名的文化乡土,具有客观的自然与人文张力,富有历史感与空间性,伴随着全球化传播而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价值;另一方面,地方戏展演的具体作品,多为历史沉淀与民间意见的表达,素材鲜活,富于生命质感,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形成陌生化与戏剧化的艺术价值。

资源价值。地方戏文化色彩浓郁,地域性与民族性异常典型,艺术形态的传承虽然遇到较大问题,但它所承载的地方资源与民族资源却具有非常大的文化潜力。大学生在当代生活中的创造动力可以借鉴地方戏,以此为基础去寻找资源转化的路径,实现另一种创新发展的文化传承。当然,资源意义上的地方戏,需要更开阔的视野与文化发展能力,在地方文化史的把握和当代文化的参与下,将地方戏资源融入具体的文化项目之中,以期实现大学生对地方戏的资源开发目的。

三、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的传承可能性

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具有内在规律性的文化本分,文化传承主体无疑是大学生。

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由此明晰:大学生主动创立的地方戏业余剧团,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它们的传承可能性如何呢?

这面临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如何传承,一是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与当代生活如何发生深度的持续的关联?第一层次的问题相对具象,有如一个社团的运行方案与操作规程。第二层次的问题则比较抽象,它既关联实际的运作过程,更强调文化史的现实取向和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型问题。

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的出现,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是与文化遗产尤其与非遗相关联的剧团则成立时间很短。作为兴趣小组的大学生团体,业余剧团采用了较为自由的组织形式,社团管理十分自由,参与者多因兴趣而集合一体,因而他们的活动没有严格的限制与规划,学习方式主要以学长引导、自学为主。活动形式常常是不定期的训练和相对确定的展演机会相结合,在大学教育体系的新老生更替中完成社团延续。这类大学生地方戏兴趣社团与其他兴趣社团一样,没有太多的文化理念与组织机制,呈现出大学生崇尚自由、个性发展的特点^[24]。本文所讨论的地方戏业余剧团不只是一种兴趣团体,而是在国家非遗运动背景下大学生自觉组建的文化遗产团体^[25]。这类团体的基本形态与兴趣团体相似,但是其又有别具一格的文化自觉意识。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以文化遗产为旨归的组织形式,强调的不是兴趣,而是文化使命。以此为基础,剧团的运行机制就不再是随意的组合,而是在非遗研究中心指导下较为严格的组织形式与专业团队:指导团队由非遗研究学者和地方戏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组成,剧团表演团队主要是大学生非遗社团的成员,指导团队与表演团队之间坚持专业标准,既由传承人直接授艺传道,也由大学生向传承人拜师求教,经过一定时间的教学与学习,大学生团队按角色分工,逐渐掌握地方戏的艺术规则、表演特点、角色技艺、表演曲目、文化体制,定期听取传承人的技艺授课,定期排演和训练地方戏目,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大学生团队中逐渐普及地方戏知识和技艺,由此让更多的大学生去了解、认识和理解地方戏传统,达成在大学教育系统中实现文化遗产的远大理想。我们看到,非遗背景下的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在具体的运行方案与传承实践层次较为有效,因为业余剧团的表演团队稳定,指导团队的专业素养与表演技艺优秀,能够在大学教育体系中通过大学生非遗社团的力量完成具体的传承实践。

在当代大学生生活中倡导地方戏,丰富多样的当代艺术与时尚娱乐主导了大学生的艺术选择与文化观念,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在短时期内以非遗社团为基础的传承比较可行,但是从长远的当代生活传播与艺术接受来看,无论是地方戏的表演团队,还是地方戏的大学传播,都难以回避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挑战。今天,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在一些大学得到了校方和专业的支持,如长江大学长江非遗社组建的荆河戏业余剧团,他们与荆河戏传承人建

立了密切的师徒关系,得到了荆州市群艺馆、荆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荆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和长江大学的鼎力支持,还受到过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湖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的指导与关注,在各级各类的非遗传承比赛中屡获佳绩,因此受到团中央的嘉奖与鼓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担忧荆河戏业余剧团的传承能力与生命力,它的传承与传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短时期内无法有效应对的,当代艺术的多元创新和快速更替的艺术潮流,并没有为古典的地方戏留下太多的生存空间。

挑战与机遇同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规律。^[26]面对大学生地方戏业余剧团的现实处境,我们有必要做些更全面的思考,去讨论中华文化复兴语境下地方戏业余剧团的可能性传承。这种讨论是基于大学生传承非遗的创新实践而言。

非遗社团基础上所创建的地方戏业余剧团是一个具有创新意味的大学生团体,他们秉承文化传统的使命感,在现代艺术形态丰富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弘扬地方戏,将文化使命与艺术承继融为一体,顺应了国家非遗运动和文化复兴战略^[27],他们所坚持的地方戏传承实践,经过数年的探索,有可能形成与现代艺术并行的传承实践模式,如此,地方戏业余剧团所传承的不再只是一个地方戏,不再只是一所大学的传承机制,它的有效文化遗产形态在提供一地一校的传承可能时,将为国家文化提供大学教育传承地方戏的范例与智慧。

地方戏业余剧团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思维。地方戏的艺术形态与戏剧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但随着文化艺术样式的融合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有机关联,我们可以将艺术形态、戏剧内容和文化观念分别独立出来,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和创意资源,面向当代文化产业服务。大学教育是时代创意的策源地和研发地,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所参与的地方戏业余剧团有一个独立创作与创新传统的内动力,他们不仅有着传承地方戏的青春热情,还期待着以自己的观念与艺术思考进行原创,从地方戏的艺术宝库中寻找灵感与原料,在大学教育的学科体系中建立更为广泛的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学的合作机制。如果这种机制得以实现,地方戏业余剧团就打通了传承与创新、古典与现代、艺术与科学的未来之路,前景自是不言而喻了。

回应中国文化复兴战略和国家非遗运动的大学生非遗社团,以创建地方戏业余剧团的方式积极参与大学传承非遗的文化实践,对于新时代的文化自

信重塑具有直接的推进作用。他们探索了组建业余剧团的路径,直接向老艺人拜师,与老艺人一起推动大学传承地方戏。这种直接建基于传承人授徒传艺的大学传承,包括两层结构:一是地方戏的传统结构,一是当代大学的文化结构。二者在“地方戏”与“当代人”的关联中并置,呈现出“戏骨子”与“大学生”良性互动的文化实践形态,为中国大学传承非遗作出示范,也提供了富于启示意义的实践智慧与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 [1]魏传光.大学“立德树人”的文化省思[J].北京社会科学,2015(2).
 [2]袁川.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6).
 [3]陈超.知识、良知与理性精神[J].复旦教育论坛,2016(3).
 [4]张阳.我国大学的生态定位[J].现代教育管理,2012(6).
 [5]蔡先金.大学与象牙塔:主体与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07(1).
 [6](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林聚任,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7]袁广林.从象牙塔、服务站到灯塔[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5).
 [8]王建华.大学理想与精英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4).
 [9]郭景萍.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社会分层[J].学术论坛,2004(1).
 [10]徐伟荣.天人合一的文化地标[J].东吴学术,2010(3).
 [11]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J].文学评论,1998(6).
 [12]杨东平.教育工厂培养的是考试机器[J].中国青年报,2013-10-

- 24(02).
 [13]丁念金.论中国师道文化的重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7(4).
 [14]肖群忠,刘家春.工匠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湖南社会科学,2015(6).
 [15]金运成.审视与重构:文化立场中的大学师生关系[J].现代大学教育,2013(1).
 [16]曹顺霞.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自律和他律[J].广西高教研究,2000(3).
 [17]郭金龙,陆宇杰,许鑫.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大学生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2(12).
 [18]李楠,郭比多.经典的启示——从《罗帕记》的成就说起[J].黄梅戏艺术,2011(4).
 [19]夏荔.辽剧——从历史走来[J].戏剧文学,2016(8).
 [20]燕良.生命哲学中的教育理念蕴涵[J].高等教育研究,2004(7).
 [21]罗关德.风筝与土地: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J].文学评论,2015(4).
 [22]李维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重建及其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4(2).
 [23]张慧.当代地方戏发展的困境与保护发展路径[J].东岳论丛,2013(12).
 [24]王宏维.论大学生社团文化培育的三个基本向度[J].思想教育研究,2013(1).
 [25]彭岩.高校古琴文化传承模式新思考[J].音乐传播,2016(1).
 [26]张俊芳,许修杰.论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行机理[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5).
 [27]孙正国,杨军.重塑认同:国家非遗运动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双向考察[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The Amateur Theatrical Troupe of Local Opera”;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Universities

Sun Zhenggu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It has been ten years of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college students' Association plays the role of the practice subject, they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e becau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opera has a positive practice in many universities, some universities have explored the way to build amateur theatrical troupes and took the old artist apprentice as their teacher directly, thus promoting the local opera with the old artists. University inheritance based on the inheritor teaches pass on their technical skills includes two-layer structure; One is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the local opera, and the other is 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The two are juxtaposed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opera” and “contemporary man”, they present a cultural practice form of “opera bone”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practical wisdom for the Chines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amateur theatrical troupe of local opera; old trouper; creative practice; inheriting wisdom